

学习中国文化

中华民族的伟人——鲁迅

向叙典



甘肃张掖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024354-

学习中国文化 革命的伟人——鲁迅

向叙典



200202431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前 记

这本小册子的基本内容，是我以前在甘肃师范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鲁迅专题的提纲。这分讲授提纲，曾在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编写的《鲁迅作品选讲》上刊用。现将该稿加以修改增删付印，以应教学工作之急需。

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他的一生是光辉灿烂的一生。他的著作，内容博大精深，艺术形式完美。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以及图书资料的限制，认识或有不全，解释或有不准，观点或有不是，论述或有不清，论断或有不妥，评价或有不妥，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向 叙 典

1978年10月31日

目 录

前 记	(1)
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1)
革命的小说	(26)
1、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26)
2、深刻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41)
3、批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缺点	(53)
4、《故事新编》	(61)
5、艺术特色	(72)
战斗的散文和诗歌	(81)
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	(105)
1、前期杂文的思想内容	(107)
2、后期杂文的思想内容	(120)
3、艺术特色	(154)

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鲁迅，姓周，名树人，字豫才，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县）。“鲁迅”，是他从一九一八年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

伟大的人物是由时代造就的，是由伟大的革命斗争的乳汁哺育成长的。

一八四〇年，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继续用恐怖的方法改造世界，他们用兵舰、大炮打败了中国的腐朽的封建的清朝政府，此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西方资产阶级为了寻找新的市场，疯狂地掠夺和残酷地压迫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发动侵华战争。在帝国主义的政治、文化、军事侵略的面前，腐朽没落反动的清朝政府，接受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如：

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港口，永远割让香港，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关税要同英国协定，而中国却不能自主，英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犯了法，中国无权依法惩办，而要由英国领事审判；

一八四四年七月的中美《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年十月的中法《黄埔条约》，则包括了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这些最基本的不平等条款；

通过一八五八年的中俄《璦琿条约》，一八六〇年的中

俄《北京条约》，一八六四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皇先后霸占了我国领土一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

一八六〇年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中国增开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为通商口岸，准许华民赴英法属地或外洋别地做工，割让九龙为英国领地，英法帝国主义分子可以到中国内地随意通商、传教、游历，赔偿英国八百五十万两白银，法国八百二十万两；

一八九五年的中日《马关条约》规定割让台湾全岛和所有附属各岛及澎湖列岛，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人可以在中国内地从事工商活动；

一九〇一年的中德、奥、西、比、英、法、美、意、日、荷、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清政府负责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拆除京津一带防御工事，外国使馆内由使馆自己防守，北京至山海关主要地区由外国驻军；

这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如利刃宰割着中国的肢体，如吸血鬼吮吸着中国的膏血，如磐石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如绳索捆绑着中国人民的手脚。阴险狡诈的沙皇俄国，不仅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仅一八五八年，它趁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机会，不发一兵，不费一弹，“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德法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页），而且超越不平等条约，霸占了我国大片的领土。清朝政府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慈禧太后公然无耻地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把中国推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民蒙受着深重的灾难。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侵略，就有反侵略的斗争。“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毛泽东选集》第595页）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都表现了中国人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精神。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这一时期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这种基本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封建主义。

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在列宁的号召下，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革命由于有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表现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气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了五卅运动、北伐战争，掀起了伟大的工人农民的革命斗争风暴。一九二七年，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包括革命知识分子在内的其他小资产阶级，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文化革命，英勇地反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动员和组织群众投身于

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发起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伟大的鲁迅，就是由这种伟大的革命斗争时代造就的。他的一生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斗争，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鲁迅出生于一个日趋没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周致福（1837——1904），后改名福清，号介孚，出宰过江西金溪县，任过内阁中书。父亲周凤仪（1860——1896）后改名文郁、仪炳，号伯宜，是读书人，中过秀才。母亲鲁瑞，出身农民家庭，“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鲁迅自幼聪颖，五六岁时他家里的亲戚朋友都喜爱地称他为“胡羊尾巴”，以誉其小而灵活。当时家里有四、五十亩水田，不愁生计。一八九三年，他祖父因科场作弊案，被捕下狱，接着父亲又重病卧床。鲁迅的家从此就由“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这种变故，使他遭受了寄居亲戚家而被人“称为乞食者”的酸辛，拿着衣物首饰去典当而受到商人的侮辱。这种生活经历使少年的鲁迅明白了许多事情：“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一八九八年春，十八岁的鲁迅接过母亲给他筹办的八元旅费，“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离开绍兴，前往南京。五月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多以后，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在南京学习四年，“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朝花夕拾·琐记》）但在此期间，鲁迅开始接触了“新学”，否定

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坚信人定胜天，发出了“文章得失不由天”的战叫。这一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当时著名的维新人物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学说的积极宣传者赫胥黎所著的《天演论》（今译本为《进化论与伦理学》）。这部书总的说来，前半部分是唯物的，后半部分是唯心的。鲁迅反复地研究了这部书，能把严复的译文整章整章地背下来。从此，鲁迅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55页），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56页）。鲁迅用它作为武器，在文化战线上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百日维新”的流产，洋务运动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辛丑条约的签订，使鲁迅深深地认识到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帝国主义的凶残暴虐，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并积极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九〇二年春，鲁迅怀着追求救国救民的真诚的革命愿望，东渡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与此同时，鲁迅积极参加当时在东京的反清革命活动。后来他写道：“除了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些活动，既是鲁迅反清爱国思想的体现，又是进一步提高他反清爱国思想的课堂。他在《斯巴达之魂》这篇译述的文章中，寄寓了他宁可为国战死而决不苟且偷生的烈火般的爱国主义的激情。他大声疾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幗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在《中国地质略论》一文中，鲁迅激昂慷慨地说：“吾广漠美丽最可爱

之中国”，“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检；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覬覦”。痛斥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是“因迷信以弱国，利身家而害群”的“民贼”；清朝“老病昏聩之政府”是“引盗入室，助之折桡挠栋，以速大厦之倾”的卖国贼。并写下了《自题小像》一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立下了为中华民族而献出自己的一腔热血的钢铁誓言。实践证明，鲁迅的一生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一生。

一九〇四年九月，鲁迅怀着医学救国的幻想，离开东京，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自序》）。不久，严酷的现实粉碎了鲁迅美丽的梦想。

一九〇五年，日俄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进行的狗抢肥肉的战争结束后，学校当局常在课间放映一些日本军国主义战胜沙皇俄国以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功的纪录影片。一次，鲁迅在画面上看到一个据说是给沙皇军队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绑着，正要砍头示众，而围观的中国人身强体壮，却显出十分麻木的神情。看自己的同胞被外国强盗杀害，竟然无动于衷！这件事对鲁迅的刺激很大，他深切地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

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于是决定弃医从文，提倡文艺运动，把文艺作为最主要的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的工具。毫无疑问，要救中国必须唤起民众，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革命的文艺作品能教育人民。但是，它在旧中国的条件下，在百分之九十左右是文盲的国家里所起的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的作用是有限的，不是“第一要著”。当时，鲁迅还没有认识到改变人的精神状态的根本途径是革命的实践；只有革命实践才能迅速地把人民团结起来，才能迅速地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

一九〇六年春，鲁迅从仙台到东京，开始自觉地用文艺作武器参加民主革命的斗争。他计划创办《新生》杂志，因人员和资金不足而流产了。接着，他就着重翻译和介绍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具有反抗斗争精神的作品以及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把文艺活动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在此同时，鲁迅积极地投身于当时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派反封建复古派、洋务派、改良派的革命斗争的洪流，并于一九〇八年，经章太炎介绍，参加反清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在此期间，鲁迅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论文。这些用文言写成的论文，不仅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重要资料，而且是中国革命史和思想史上的宝贵文献。在这些论文里，鲁迅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立场上，用进化论作思想武器，批判帝国主义、批判封建复古主义者、改良派、洋务派，阐明自己的救国救民的主张。他痛斥帝国主义分子是“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弱小以逞欲”的霸权主义者，是“兽性爱国之士”（《破恶

声论》)；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无非是“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所谓“众”只不过是些“至愚屯之富人”，“善垄断之市侩”和热衷于“奔走干进”的“无赖之尤”（《文化偏至论》）而已。鲁迅极其深刻地指出：“死抱国粹之士”（《科学史教篇》）、“抱残守阙之辈，耳新声而疾走”（《人之历史》）的封建复古主义者，是没有前途的，“非自杀以从古人，将终其身更无可希冀经营”，就是“束手浩叹，神质同隳焉而已”，因为人类社会“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摩罗诗力说》），就是说历史决不会依照复古派的主观愿望而倒退。鲁迅尖锐而深刻地揭露那些“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全盘西化的洋务派，是“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的钻营禄位的无耻之徒；那些鼓吹君主立宪的改良派，大多数是“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措置张主，辄失其宜”，“宝赤菽以为玄珠”的“盲子”，而其中的少数人，则是“志行汙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垂微饵以冀鲸鲵”的“巨奸”（《文化偏至论》）和野心家；这些“所谓识时之彦”，只不过是“奴子性”十足的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的言行不仅于国无补，于民无益，而且“鸩毒日投，适益速中国之隳败”（《破恶声论》）。

（鲁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当时，他一方面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亚洲的“文明先进”的国家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又为一八四〇年以来“丧师辱国”、“受侮既甚”（《破恶声论》）的严酷现实而痛心；既对封建顽固派，“孤立自是”、“精神沦亡”、“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

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摩罗诗力说》），极其憎恨，又对“轮才小慧之徒”，“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文化偏至论》），深恶痛绝。鲁迅和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一样，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毛泽东选集》第1359页）。因此，鲁迅提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主张，但是鲁迅反对形式主义的模仿，坚持批判吸收、外为中用的原则。他说：“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文化偏至论》）。同时，鲁迅认为学习西方，建立“人国”，应该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他说这些弊病，“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文化偏至论》）。当时中国受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经常挨打，每战皆败，并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社会制度腐败是一个原因，经济和科学技术落后也是一个原因。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指出，必须大力发展科技事业，救国“大业之成，此其枢纽”。“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

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于拿破仑之战将”。鲁迅虽然认为科学是救国救民的“本根之要”，但是“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趋于无有矣”。所以，必须有文艺来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积极倡导“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革命文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热情赞颂拜伦、雪莱、裴多菲等民主革命诗人“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具有“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惊人的毅力，“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是“精神界之伟人”，并热切希望中国“精神界之战士”；“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摩罗诗力说》）即用文艺来制造革命舆论，使人民群众感奋起来，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斗争。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鲁迅在自然史观上是唯物主义的，又从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践中，取得了“社会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科学史教篇》）的辩证法的认识，但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他把庸俗的唯物主义误认为哲学上的唯物主义的 worldview，把唯物主义误认为“物质万能之说，且逸个人之情意，使创造之力，归于枯槁”（《文化偏至论》）而加以排斥；把唯心主义误认为是崇尚精神，“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其光辉，于人生为无当”。

（《文化偏至论》），而极力赞颂；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对立，被误认为重视物质生活和崇高精神生活的对立；并受尼采超人哲学的一定的影响，对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估计过高，而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则认识不足。这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上的差别，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和反动的尼采在政治实践上和阶级本质上的根本对立。鲁迅是希望“精神界之战士”出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外抗侵略，内救中国；而尼采则是鼓吹超人哲学，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在国内残酷地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和对外实行侵略扩张进行辩护。因此，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揭露和批判尼采“别说超人。虽云据科学为根，而宗教与幻想之臭味不脱”，超人哲学是伪科学。

一九〇九年夏，鲁迅离开日本，返回祖国。起初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任化学教员和生理教员。一九一〇年秋，任绍兴府中学的监学兼教员。辛亥革命爆发后鲁迅衷心地拥护革命，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组织武装演说队，进行宣传活动，扩大革命影响。并在《〈越铎〉出世辞》中，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放声欢呼：“国土桓桓，则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大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孰善赞颂，庶猗伟之声，将充宙合矣”。认为“共和之治，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继自今而天下兴亡，庶人有责”，因此希望通过《越铎》日报，“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毅之精神”。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虽然把皇帝赶下了台，结束

了封建帝制，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一九一二年二月，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任教育部部员，五月，随教育部迁北京，八月被任命为金事、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等事宜。在此期间，鲁迅目击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勾结起来，破坏中国的民主革命，“掠夺中国，帮助中国民主、自由的敌人！”“并与那个野心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50页）造成了“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的严重局势，人民群众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之下，“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鲁迅既痛心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又因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未到来而看不见革命的出路，因而陷入了寂寞与苦闷之中。五四运动前的一段时间里，鲁迅在读古书、抄古碑、研究佛经和中国古代文学上度过了大量的时光。他在寂寞中冷静地思考，在苦闷中艰难地探索，虽然没有青年时期那样激昂慷慨，但思想磨炼得更加深刻了。在读古书研究历史时，联系“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的严酷现实，认识到封建主义吃人的反动本质，剥削阶级残害人民的种种鬼蜮伎俩，更加激起了鲁迅“中国改革之不可缓”（《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的革命热情。只是，这种热情如火山的熔岩被压在地底，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喷射出来。

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当时的先进分子提倡民主和科

学，即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反对专制，反对迷信，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矛头直指维护封建主义的孔学。这种斗争不断深入发展。一九一七年一月，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在《孔子与宪法》一文中，痛斥孔丘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指出将孔教列入宪法，是“专制复活之先声”。

一九一七年冬，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胜利了。它使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中华民族和人民革命的新希望，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在《新青年》著文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廿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庶民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廿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并且满怀信心地指出：“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BOLSHEVISM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寂寞和苦闷中的鲁迅看见了人类“新世纪的曙光”（《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给了鲁迅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促使鲁迅从寂寞和苦闷里振奋起来。火山里的熔岩爆发的条件成熟了。鲁迅遵奉革命先驱者的“将令”，在文化战线上，以前所未有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一九一八年初，鲁迅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委员会工作。五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直捣“孔家店”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其革命思